

新中国75年来的减贫成效举世瞩目

□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常启德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中国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脱贫攻坚便是其中尤为耀眼的一项。中国在脱贫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有效举措紧密相关。中国深知消除贫困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关键。

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在这个体系下面又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目前这个目标中的前5个都没有完成。这5个目标分别是：第一，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第二，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第

三，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第四，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第五，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为什么联合国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全世界在消除贫困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好。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实现消除贫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其他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包括更好地推行平等、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的自尊，让全人类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升。

尽管现在全球在经济表现上有普遍意义的提升和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现象。比如，非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在急剧增加，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教育、医疗远远不够，甚至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仍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人类的发展也伴随着诸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法治上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以及政治上的动荡所带来的不安定。事实上，现状可能没有我们所见到的繁荣这么让人乐观，全球正处于各种资源配备不均衡和不匹配的冲突之下。所以，我们应当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严谨的工作。

75年来，中国变化巨大。中国在

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中国已从一个纯粹的受援国转型发展成为援助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帮助了很多其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句古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联合国系统在1979年进入中国，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与中国开始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高度契合，所带来的许多援助和资源都致力于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用于终止贫困、终止饥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国有企业改革，首创了类似于外商直接投资这样的模式，有效推行了多元化的发展，充分拥抱了市场经济，而且在多元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的高效治理使自己成为市场经济的推动者。

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中国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主要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强烈的让人摆脱贫困的政治意愿。拥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才能做好减贫的工作。第二，中国政府的超强执行力让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减贫政策能够有效地执行和落实到位。第三，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也离不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很多国家进行合作，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都使中国的减贫事业得到了突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这个模式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有了强劲的动力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曾亲自写信给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提到的“不让任何人掉队”，与习近平主席讲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不谋而合。

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当中积累的经验丰富而广泛，可以称得上是“经验库”。同时，中国的经验、模式值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用8年时间使近1亿人口成功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的成功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规模这样巨大的国家都能够实现绝对脱贫的成功，那么其他小国家的脱贫更应该具备好的发展前景。

75年的历程表明，中国能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很多。例如，倡议中国更多地在联合国体系内与非洲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将联合国、中国和非洲相应的东道国纳入系统的发展规划之中，这样不仅能够推动全球多边主义的更好发展，同时也为全球治理和全球复苏铺设了道路。未来，这样的合作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

世界各国资源循环利用的经验

□ 王凯军

在当今全球资源紧张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资源循环利用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攀升，环境承载能力面临巨大压力。世界各国在资源循环利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废弃物剧增与治理滞后的全球现状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固体废弃物、电子垃圾和塑料垃圾的产生量急剧增加，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如联合国机构发布的《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电子垃圾的产生量相比2010年增长了82%，达到了创纪录的6200万吨，相当于全球每人每年产生了7.8公斤电子垃圾。根据报告，电子垃圾产生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回收量增长速度。2022年全球仅22.3%的电子垃圾被妥善收集并回收利用。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30年，预计全球电子垃圾产生量将比2022年增长33%，达到8200万吨，而全球电子垃圾回收率将降至20%。

全球资源浪费和垃圾产生带来多方面挑战。资源过度消耗导致短缺严重，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我们必须寻找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大量的垃圾会污染环境，影响生态平衡，威胁人类生存健康。如有害物质未，会危害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加剧全球污染问题。处理垃圾还会耗费资金和能源，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据估算，全球每年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还对环境造成了二次污染。

资源循环回收再利用迫在眉睫。它是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关键途径，可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提高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减轻环境压力，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从资源角度看，地球资源有限，人类需求增长，不循环利用将面临资源枯竭。从环境角度看，可改变传统资源开采利用带来的污染和破坏。

资源循环回收再利用好处众多。首先，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例如，回收金属、纸张、塑

料可减少原始材料开采加工。据估算，每吨回收的纸张可以节约17棵大树、26000升水和4000度电。其次，可创造就业机会，在回收、加工和再制造等领域需要大量劳动力。全球范围内，资源循环回收产业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此外，能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企业为提高回收率和质量需研发新技术工艺。最后，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通过资源循环回收再利用，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各国资源循环利用的做法

构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法律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坚实保障，众多国家都制定了详尽且严格的法律法规。日本在此领域相对领先，核心法律包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家电回收法》《容器包装回收法》等。数据显示，日本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率超过80%，其中空调达82%，电视机为80%—81%，冰箱为80%—82%。欧盟的法律框架包括《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废物框架指令》《包装及包装废弃物指令》，美国则以《资源保护与回收法》为主。在这些法律的推动下，资源回收产业规范化，废弃物分类回收融入日常生活，大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打造全面高效的回收体系。构建完善的回收体系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欧盟广泛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要求制造商对其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特别是废物管理。该制度覆盖电子废物、包装废弃物、废旧车辆、轮胎等多种产品，制造商需承担回收、处理及再生费用。在此原则指导下，多数欧盟国家建立了详细的垃圾分类系统，帮助家庭和企业有效分离可回收材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例如，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总体废物回收率约为67%、包装废物回收率超过71%，德国城市垃圾回收率达66.1%，德国垃圾分类准确率超过90%。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核心环节。日本北九州经验较为典型，作为日本首个生态城，北九州依托产业共

生和废物资源化的理念，实现了从重污染工业城市向环保示范城市的转型。北九州生态工业园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与废物交换，实现废物最小化。比如，将钢铁废渣提供给水泥厂做原料，废热则用于居民能源供应。在废物资源化方面，家电回收中心拆解、分类再利用电器，将塑料、金属等重新投产，制成新产品。北九州的案例表明，循环经济不仅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还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驱动力。欧洲在废物回收的同时，开发先进技术用于处理和资源再生，提升了回收效率并推动再生材料市场发展。美国在资源回收技术研发上投入较大，尤其在电子垃圾回收领域。美国一些企业通过先进的化学处理和物理分离技术，能高效提取电子垃圾中的贵金属如金、银、铂等，同时分离出铜、铝、塑料等其他有用材料。据研究，美国部分电子垃圾回收企业的回收率已超过70%，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

多要素协同发力的全球经验启示

政策法规在资源循环利用中起着关键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能够清晰地界定政府、企业和公众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为资源循环利用的各个环节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确保各方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引导循环资源利用的发展方向。比如，通过立法确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使生产者对其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负责，督促制造商承担产品回收、处理及再生的相关费用，是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的有效手段。同时，合理的激励机制，也促进了各方的积极参与。比如，采用补贴、税收减免、绿色信贷等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资源循环利用。

高效的回收体系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这一系统通常包括科学的废物分类制度、完善的回收基础设施和畅通的回收渠道等多个方面。合理的分类制度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有效分离可回收材料和其他废物，有助于简化后续处理流程，进而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而先进的回收设施和技术，则是确保回收过程高效且环保的核心要素。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管理回收流程，已经成为提高回收率的有效手段。例如，智能化的垃圾分类APP可以增强公众参与度，实时的数据监控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此外，通过建立高效的物流网络，确保回收物资快速、准确地送达处理中心，也是提高回收效率不可或缺的一环。

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动力。循环经济产业通过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不仅减少了对原生资源的依赖，还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模式下的产业活动自设计阶段便融入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考量，力求在生产、使用乃至废弃的每个阶段，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政策优惠、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励企业投入到循环经济产业，推动产业间协同合作，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例如，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将不同产业的企业聚集在一起，通过资源共享和循环利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衔接。这不仅有效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支柱。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回收技术的不断革新，直接决定了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和效果。从提高废弃物的分类精度到优化回收工艺，技术创新始终是推动这一领域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此，政府需要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创新，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同时积极引进和应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此外，政府可以通过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和技术推广，从而有效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这种协同创新机制不仅有助于加速技术进步，还能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防范数字贸易中的全球价值链参与风险

□ 项松林 张凯宁

近年来，数字贸易作为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的贸易活动，涵盖数字产品和服务交易及数字化贸易流程等，迅猛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新引擎。中国发展数字贸易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需统筹发展和安全，关注并防范全球价值链参与风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蓬勃态势。世界各国不断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投入和支持，推动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化进程正在推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消费发生深刻变化，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迅速崛起。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上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源优势，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规则。发展中国家则在努力追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数字贸易发展路径，亚太地区典型代表包括《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然而，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也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如数字鸿沟的加剧，部分地区和群体因技术、基础设施等限制，难以充分参与数字贸易；随着数据跨境流动的增加，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尚不完善，各国在规则制定上存在分歧，导致贸易摩擦和不确定性增加。

我国是世界数字贸易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数据资源十分丰富。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贸易数字化应用场景，叠加大量数字创新人才的智力支撑，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5G、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和应用成效显著，具备在数字贸易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技术基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自2019年首次提出“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数字贸易发展。国际合作取得明显进展，突出表现在：一是在WTO电子商务谈判先后提出电子支付、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动等提案，多数被纳入共识；二是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进程；三是开展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签署10项含数字经贸章节的自贸协定，与东盟、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也纳入了相关议题。

在国际环境中，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有不少需要防范的问题，特别是与领先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发展角度看，虽然总体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仍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挑战。从开放角度看，数字贸易更多涉及服务业。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还有待增强，大量生产性服务如专利、咨询、会计、教育、金融等都需要进口。从规则角度看，我国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式模板”。从数据泄露角度看，反映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的产业信息、商业秘密、国防安全等大数据，如果被外国窃取，将使整个产业发展情况完全暴露在外。从治理角度看，国内数字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高效有序的数字市场，面临被相关国家“数据流动圈”排除在外的风险。

应对上述挑战，首先要统筹开放与安全。这既是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妥善应对潜在风险的前提。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开放，推动智慧物流、远程医疗等新兴领域的发展，积极探索数据贸易，提高数字知识产权服务、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软件、算法算力等新型数字贸易比重，提升数字贸易价值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增强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数字技术“卡脖子”难题。

其次要完善数据监管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量逐年上升的背景下，防范大数据泄露风险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协调与统筹，建立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体系，制定既能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筑牢安全屏障，又能繁荣数字贸易的综合管理体制。同时，要重视行业自律组织和企业的作用，发挥其更为熟悉自身数据重要性的特点，在根源上防范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风险。推动数据安全技术创新，需要密切跟踪全球规则动态，加强同国际组织合作，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确保数据得到有效保护、合法利用、有序流动。

最后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分散化、碎片化态势，亟须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我国要依托自身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与监管实践，积极参与全球规则谈判，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多边层面，坚持规则导向和多边治理模式，利用WTO平台宣传我国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共商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努力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大限度激发数字贸易市场活力。在区域层面，深化与各区域集团的数字贸易对话与合作，增强“一带一路”和RCEP等合作平台影响力、感召力，大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吸引更多沿线国家参与其中。在双边层面，充分考虑贸易伙伴安全关切，与相关国家共建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倡导建立更高水平自贸协定。同时，充分发挥大国担当，主动削减数字贸易壁垒，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在国内层面，支持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率先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鼓励国内专家学者加快研究数字贸易规则，特别是在跨境数据流动、本地存储、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上，提出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要求的规则。

数字贸易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各国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需要将推动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作为数字贸易政策设计的核心，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现阶段比较优势和中长期战略考量设定发展目标。发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数字服务出口基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等制度创新优势，推动我国数字贸易经营主体、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做大做强。

